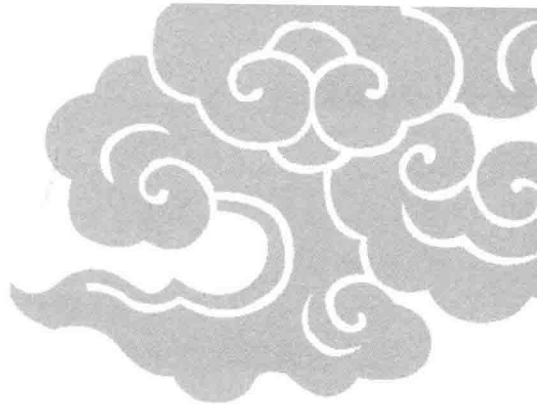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家谱知识

家谱是与家和家族相关的重要典籍，又称族谱、宗谱、房谱、支谱、氏谱、家乘、家牒、家传、谱系、谱牒、玉牒等，是以特殊形式记录家族的来源、迁徙、繁衍、生息、荣衰、升沉等全过程的文献，一向被认为是家族的生命史，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性质、内容、体例和价值，同时还有悠久的编修历史、漫长的演变过程。因此，要想了解家谱，编好家谱，有必要系统学习家谱知识。

一、家谱的起源

家谱作为与家和家族相关的历史文献，其本身的起源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过程。就一般情况而言，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家谱萌芽于殷商，起源于周代，而在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社会早期，人们通过口耳相传或结绳记事等方式，同样传承与后来的家谱近似的内容。因此，家谱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类发展历史的缩影。

1.原始状态的家谱

就本质而言，家谱的核心是辨血统、“明世系”“使人不忘乎本末”，具有通过血缘关系区分彼此的作用。从人类发展的进程看，这种区分的必要性最早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当时的人们已经摆脱了原始社会的群婚杂居关系，出自同一个女祖先的人生活在一起，为了区分长幼次序和纪念那些死去的祖先，保证氏族内部的延续和稳定，保护财产不落入外人之手，人们由最初言传身教的现身说法帮助辨别彼此之间的关系、记忆代际传承的历史，进而发展到口耳相传，当懂得结绳记事后，又利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来达到辨别和记忆的目的。从母系氏族社会经父系氏族社会，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直到文字出现之前，口耳相传、结绳记事等都是原始人类区分血缘关系、记忆传承世系最为主要的方式。由于这些方式的作用与后来的家谱极为近似，我们称之为口传家谱或结绳家谱。

（1）口传家谱

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忆传承世系，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根据不少学者研究，我国传说时期的三皇五帝以及



夏商周等王朝祖先的世系，就是通过口耳相传、再由文字记录下来的。其中如三皇五帝中伏羲的世系，西晋人皇甫谧所编的《帝王世纪》记载为“风姓也。包牺（即伏羲）氏没，女娲氏代立为女皇，亦风姓也。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包牺氏之号也”。这段记载不仅涉及15代人的世系传承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在伏羲及其后代时还没有文字，这些世系显然是根据传说追记而来。再如炎帝及其后代的世系，《山海经》记载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訖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后土，后土生噎鸣”，同样是依据传说。又如黄帝及其后代的世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说黄帝正妃嫫祖“生二子玄嚣、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颡顼也。帝颡顼生子曰穷蝉。颡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嫫祖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又记载虞舜至黄帝之子昌意之间的世系说“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颡顼，颡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情况都与上述伏羲炎帝的记载相同。至于《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三代世表》，以及《世本》《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等书中关于三皇五帝以来至夏商周三代王室祖先世系的记载，同样也都是根据传说而追记。这种被后世以文字记录下来的世系，在传说时期实际上也就是口传家谱。

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祖先的历史都属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的传说史，至于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不少属于本民族的口传家谱，有些口传家谱甚至直到近现代还在口耳相传。如居住在今云南

福贡县知子罗村一带的怒族人斗霍部落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20世纪民族调查时还能依次说出41代祖先的名字，即“茂英充、充罗并、罗并者、者茂特、茂特绷、绷喜耀、喜耀维、维曲维、曲维能、能波赤”等，其中的“茂英充”是位女始祖，由她往下传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而居住在普乐村的蜂氏部落则可以说出女始祖茂英充以下64代祖先的名字，即“茂英充、充足人、阿都都、都沙布、沙布必、必那沙、那沙以、以纳比、纳比欢、欢米滋”等。64代人联系起来，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其口传家谱的历史更为悠久。又如生活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带的彝族人，有一个位居彝族四大家族之首的阿摸惹古家族，在其阿邱拉玛支系中也流传着自己的口传家谱，记录了自“慕阿乌”到“则伙古步”之间122代世系，借助这部家谱，族中的每个男子都可以与一位祖先联系在一起，因此也被要求背诵这些世系，把它熟记于心。上述这些少数民族家谱，都是口传家谱的活化石。

（2）结绳家谱

结绳记事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做法，即《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中的“结绳”，一些少数民族直到近现代时期还在使用这种方法，在绳子上打结，以打结的形状、多少等来记录发生的事情、人口的变化等，其中与人口变化相关的又包括人口传承的世代、人口数量、男女比例、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通过结绳来记录人口传承世代的做法近似于编家谱，因此这类的结绳也被称为结绳家谱。



被整理成文字的彝族阿摸惹古家族家谱



在我国早期的一些文献中，都有先民结绳记事的记载。如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就说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人们“结绳而用”。《周易》也说“上古结绳而治”。由此联系到前引《说文解字》中的“神农氏结绳为治”，可以确定，至少古人认为在神农氏等人生活的远古时期出现过结绳记事这种现象。但那时究竟怎样结绳记事，或者怎样在结绳中体现类似家谱所记录的世代传承情况，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倒是在我国的鄂伦春族、满族、锡伯族、哈尼族、门巴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中，直到近现代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结绳记事的习惯，其中的一些还明显带有结绳家谱的性质。尤其是鄂伦春族，一直保留着在马鬃绳上打结表示家中有几代人的传统，如果一家三代人就打三个结，如果五代人就打五个结，这根马鬃绳显然就是典型的结绳家谱。再如满族祭祀祖先时，通常要祭祀一个用黄布制成的口袋，因为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子孙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弓箭、五彩布条等。其中，小弓箭代表男孩，五彩布条代表女孩。透过“子孙绳”的长短和系物多少，可以判定其人口多寡和辈数多少、每一代人的男女多少。无疑，这样的“子孙绳”实际上也是结绳家谱。此外，锡伯族也有与满族近似的“子孙绳”，只是当族中增加了一代人时，在绳上挂一块背式骨表示辈分。如果想知道族中有多少代人，数一数有多少背式骨就可以了。

2. 萌芽状态的家谱

无论是口传家谱还是结绳家谱，尽管具有家谱的性质，但仅能够记录族人的传承情况或相互之间的关系、男女数量等，其所包含的信息量远非后来的文字家谱可比。因此，当成熟的文字在我国殷商时期出现以后，其作用之一便是取代口传家谱和结绳家谱，担当起了记录家和家族传承历史的责任，并在经历了甲骨文家谱和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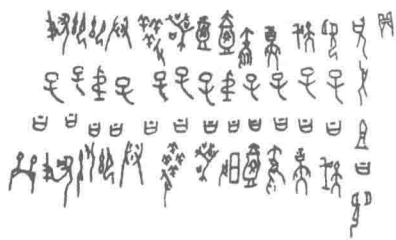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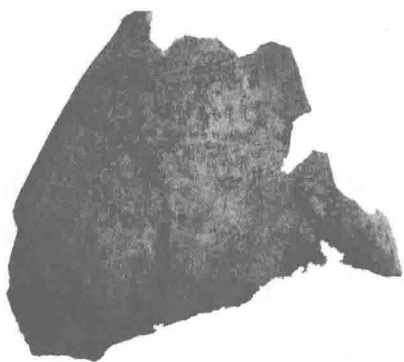
家谱等阶段以后，于周代随宗法制度的完善而正式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家谱。

（1）甲骨文家谱

甲骨文家谱，即通过甲骨文记录下来的家谱。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是殷商王室、贵族用于占卜或祭祀、狩猎的，因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而得名。目前已发现15万多片有字甲骨，4500多个不同字形，其中已有2500多字被识别。从内容上看，这些文字主要记录占卜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但也有一些记录人物世系或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类的甲骨文便是甲骨文家谱。

在目前可见的甲骨文家谱中，常被提起的有三片甲骨。其中之一见于容庚等编的《殷契卜辞》中，序号为209。另一片见于董作宾的《殷墟文字乙编》，编号为4856。还有一片收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中，序号为1506。三片甲骨中的前两片文字不多，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的释文分别是“□子曰□，□子曰□”“帚妥子曰为□”；第三片因为刻于商王武丁时期、完整记载了倪（兒）氏家族11代人的世系而最为珍贵。该片甲骨是一片牛肩胛骨，所刻文字从右至左共13行，每行1句，除第一行5字外均为4字，共53字。这些字基本都被释读出来，其中的一种释文是：

“兒先祖曰吹，吹子曰卫，卫子曰燕，燕子曰帷，帷子曰壹，壹弟曰启，壹子曰噩，噩子曰徕，徕子曰洪，洪子曰御，御弟曰修，御子曰射，射子曰商。”从中可见，这些文字是典型的倪（兒）氏家族世系表，其中涉及14人，共11代。14人中属于父子关系者11人，兄弟关系者2人，关系不明者1人。由于11代人生活时代的前后跨度有300多年，加上刻在甲骨上的时间是距今3200多年的商王武丁时期，因此，如果从这一家族的先祖吹算起，其距今的历史已有3500多年，大约相当于商朝早期，可见这种甲骨文家谱历史的久远了。



兒氏甲骨及其刻辞摹写

另外，在已经发现、带有文字的甲骨片中，有些文字记载的是占卜或祭祀祖先的内容，其中涉及祖先的名字、世系，从而也带有甲骨文家谱的性质。如收录在《殷契粹编》中第112片甲骨上的部分文字是“乙未酒兹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十，小甲三”，《殷墟文字甲编》中第2282片甲骨上的部分文字是“求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牡”，《殷虚书契后

编》上第20片甲骨中的部分文字是“甲辰卜贞，王宾，求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衣、亡尤”，这些文字经甲骨文专家研究、考证，都认为是商王及其先公先王的世系，可以与《史记·殷本纪》中的世系相互印证，同样也近似于甲骨文家谱。

(2) 金文家谱

在我国文字于殷商时期出现并成熟以后，人们记载家族的世系不仅刻在龟甲兽骨上，还有些刻在青铜器上。特别是从殷商晚期开始，青铜器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越来越多。刻在青铜器这种金属器皿上的一些具有家谱性质的文字，后来也被研究者称为金文家谱。

目前所见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家谱，商代和周代的都有。其中，商代的金文家谱仅收录在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书中的就有4件，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相关家族的传承世系和人名。如被称为

“祖丁戈”的一件青铜器，上面的铭文是“祖丁，祖己，祖乙”，含义应是以干支命名的祖先的名字，与商代人喜欢用干支命名的习惯相合，所表述的大抵是三位或三代祖先。另3件青铜器都是戈状礼器，因为相传出土于易州（今河北易县）而被称为“易州三戈”或“易州三勾兵”“商三勾兵”，或因其分别涉及6位祖、父、兄的名字而被称为“六祖戈”“六父戈”“六兄戈”，或称“大祖日己戈”“祖日乙戈”“大兄日乙戈”。经过古文字专家的释读，“六祖戈”的铭文是“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六父戈”的铭文是“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六兄戈”的铭文是“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铭文的格式大致相近，内容包括祖先或兄弟的世系、名号或庙号，其用途应是便于子孙纪念或祭祀，从性质到内容都更接近后来的家谱。

至今发现的铸有铭文的周代青铜器更多，其中不少是祭祀用的礼器，铭文中也多包含家族世系及祖先名字、功德等内容，同样也可以认为是金文家谱。其中一件由微氏家族的“墙”铸造的青铜盘上共有284个铭文，铭文中不仅列举了文、武、成、康、昭、穆等6代周王的世系，还记载了与6代周王同时的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等5代祖先的事迹，加上“墙”本人所在的一代，实际上包含了微氏家族的6代世系。此后，“墙”的儿子又铸造了一件带有96个铭文的青铜钟，铭文中的内容与“墙盘”相衔接，把“墙”称为“皇考丁公”，加上他本人共有7代世系。由于这7代人生活在自周文王到周穆王之间的200多年中，家族世系连续不断，在周代青铜器中具有突出价值，被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青铜家谱之一。另有一件与单氏家族传承世系相关的青铜“速盘”，共有372字，清晰记载了其家族自第一代祖先“单公”以来共8代人辅佐



周朝的事迹，世系传承脉络清晰，历史跨度自周初至周宣王时期，青铜家谱的性质同样明显。



西周青铜器“墙盘”

3.家谱文献的出现

历史发展到周代，随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确立，血缘观念被进一步强化，家谱作为记录血缘关系的文献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进而获得长足的发展。

(1) 史官修谱制度在周代的确立

周代是西周和东周的通称，在习惯上又称西周和春秋战国。西周时，周天子采取了“家天下”的统治模式，确立了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原本由氏族社会的父家长制演变而来，在宗族内部以大宗和小宗进行区分。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天子的儿子除嫡长子外都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就是小宗。但在诸侯的封国中，诸侯却是大宗，诸侯的儿子除嫡长子外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又是小宗。同样，在卿大夫的采邑中，卿大夫则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士之下则不再分封。可见，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宗法系统，它要求宗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十分清楚，即使宗族进一步分化出

许多新家族，也必须保持十分清晰的血缘关系，以保证宗族的维持和发展。若干年后，即使宗族人口变得十分庞大，宗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仍能很容易地区分出每一个成员在宗族中的位置，以及宗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父、祖、曾祖、高祖是谁，谁在宗族中属于嫡庶，等等。久而久之，由于宗族内部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必须有专人负责掌管宗族事务，于是，负责记录与管理周天子宗族中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等事务的官员应运而生，其所记录 and 管理的也就是周王室的家谱，这一制度也被称为史官修谱制度。

据《周礼·春官》记载，周天子所设立的掌管家谱的官员被称为小史，专门负责“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即订立王室世系、区分王室成员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祭祀还要告诉周天子祖先的忌日和名字。除小史外，还有太史、内史等官员负责管理诸侯或卿大夫的家谱。至于在诸侯国，也设有专门管理国君家谱和家族事务官员，只是官员的名称有所不同。例如，在鲁国，见于记载的就有工、史、宗、祝等官职；在楚国，相关的官员被称为三闾，“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叙其谱属”，级别是大夫。屈原就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所以也被称为三闾大夫，掌管昭、屈、景三位君主的家谱。

由于周代从天子到诸侯都重视宗法血缘关系，加上又设立了专门的掌谱官员，因此也使家谱起源的步伐迅速加快，促使其最终成为专门的家族文



《周礼》书影



献。另据史书记载，当时由掌谱官员记录和编写的家谱性质的文献还被当作教育族人的教材，使他们借以牢记“宗庙之有昭穆，以世次之长幼，等胄之亲疏”，发挥了社会教化作用，我们从中也可见由原始人类发展而来的口传家谱遗风。只是可惜的是，由于这些家谱性质的文献在当时属于周天子或诸侯的私密家族档案，尽管编写的数量可能很多但流传下来的极少，我们今天仅能从保留在其他文献中的部分资料窥见其一鳞半爪。如在传为西汉人戴德所编写的《大戴礼记》中，收录了《五帝德》《帝系》这两篇被认为是周代的文献，其内容涉及黄帝至夏商周三代祖先之间的传承关系、世系，被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三代世表》所采纳。尤其是《帝系》，一向被认为是黄帝及其后代的世系传承表，其依据尽管可能是周代以前口耳相传的传说，但被整理成相对规范的世系应归功于周代的掌谱官员，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代官修家谱的原貌。

（2）家谱开山之作《世本》

战国末年时，一部带有家谱性质的《世本》诞生于世。该书相传出自战国末年一位担任史官的赵国人之手，是“录黄帝以来迄春秋时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之作，因为所记录的都是家世本源而定名为《世本》，可惜从汉代开始逐渐残缺、亡佚，今天仅能见到辑本。从历史记载及其辑本看，该书原有15篇，其篇名已经不为人知，后人辑本中的分类也有所不同，但大抵包括“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居篇”“作篇”及“谥法”等，包含从黄帝至春秋战国时期历代帝王和诸侯卿大夫的姓氏来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死后谥号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被辑录的各篇中，“帝系篇”不仅记载了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等三皇五帝世系，也记载了陆终六子和周代的威烈王、赧王、武公等人的世系；“王侯世”记载

了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杞、滕、韩、赵、魏、齐、蜀等周代主要诸侯国君的世系；“卿大夫世”记载了周代诸侯国中卿大夫的世系，其中至少包括鲁国18个卿大夫家族，以及齐国20个、晋国22个、卫国25个、宋国26个、郑国28个、陈国28个、楚国29个卿大夫家族；

“氏姓篇”记载了黄帝以来的主要姓氏源流，由于“明世家”“式辨诸宗”，能够让人“知姓氏之所由出”，广受后人的赞誉，“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

此外，“作篇”记载了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以来的各种器物、生活用品的发明情况，“居篇”记载了历代帝王诸侯的都城所在，“谥法”记载了历代帝王诸侯的谥号及其基本含义。可见，该书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家谱类著作，后人在评价时也说“世谱之学，以《世本》为宗”。由于《世本》开创了家谱编修之风，从此以后，家谱之学慢慢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称“世谱学”“谱系学”“家谱学”“氏姓之学”或“姓氏之学”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约与《世本》同时，还有一部被传为荀子所编的《春秋公子血脉谱》，简称“公子谱”，可惜早已完全亡佚。但从谱名推断，其内容大约也是汇集帝王诸侯世系的家谱，而“血脉”二字更加形象地揭示了家谱的血缘性质。正因如此，宋代著名谱学家郑樵说“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同样给予了它高度评价。



后人辑佚出版的《世本》



二、家谱的演变

如上节所述，我国一般意义上的家谱是在周代正式形成并以《世本》的问世为标志的。此后，家谱便进入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由于在不同时期的情况不尽相同，我们不妨结合时代背景，将其过程分期进行介绍。

1. 两汉时期

《隋书·经籍志》在“谱系篇”的概述性文字中说，家谱类的著作历史悠久，“由来远矣。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秦兼天下，划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得《世本》，叙黄帝已来祖世所出。而汉又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这里实际上是把周代至秦汉的家谱演变情况进行了简要概括，意思是说，周代开创以小史官专门负责家谱事宜的先例，因为秦朝的改弦更张而受到冲击，但进入汉代后又在《世本》的影响下得到继承，并且被发扬光大。事实上的确如此。就其历史地位而言，两汉时期在家谱演变史上实际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汉书·高帝纪》

首先，两汉时期继承了周代的史官修谱制度。《汉书·高帝纪》记载，早在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就开始“置宗正官以序

宗正官以序

九族”，职责是“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王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岁一治诸王世谱，差序秩第”。意思是说，宗正是负责王室及诸侯宗族事务的官员，根据各地上交的宗室名册编写或修订家谱，借以辨别亲疏远近，以便决定他们应该享有的特权。可见，宗正的职责与周代的小史十分相近，尽管其负责的仅是皇帝和宗室的家族事务，但所编的的确是家谱。由于其职责较重，汉代还把它列为九卿之一，此后各朝也相沿成习，直到清代都有这一职务。我们今天还能在《汉书·艺文志》里见到“《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这一名称，这部“世谱”大约就出自宗正官之手。

其次，两汉时期正式把家谱称为“谱”“牒”或“谱牒”。家谱的“谱”字是个形声字，表示一种文献、簿籍，但在汉代以前还不见这一写法。直到汉代时，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历谱者，序四时之位”，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谱，布也”，都使用了“谱”字。其中，司马迁所说的“谱”就是指家谱。此外，汉代还把家谱称为“牒”“谍”，或与“谱”并称为“谱牒”“系谍”。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序》：“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又《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这些记载中的“牒”或“谍”的原义是刻印家谱的竹简或木简，与“谱”并称后都指家谱。我国至今还称家谱为“谱”或“谱牒”，这些称谓的本源都在汉代。

由于汉代对家谱的重视，促使家谱继周代之后有了新的发展。据相关文献记载，当时不仅有官修家谱，而且有私修家谱，甚至还有刻在石碑上的碑谱，一些擅长家谱的名家也知名于世。其中被后人常提起的家谱有《邓氏官谱》《扬雄家牒》等，具有家谱性质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书影

文献有《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汉书·孔光传》等，碑谱有刻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的《三老碑》、刻于延熹三年（160年）的《孙叔敖碑》、刻于光和三年（180年）的《三老赵宽碑》等。至于当时的谱学名家，最有代表性的是司马迁，他不仅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叙述了自己家族从得姓到父亲司马谈之间的世系传承、主要人物事迹、官职等情况，还利用《世本》等“牒

记”，编写了黄帝等上古帝王和中古诸侯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以及《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等。他的这些著作，家谱的性质都非常明显，毋庸赘述。

此外，汉代还有一些被后来归入姓氏类著作中的文献，主要有《白虎通·姓名篇》《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其内容也与家谱有关。

2.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的兴起和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特殊需要，“而家谱特盛”“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尤其是在东晋南朝时，朝廷选官用人和社会上世族门阀之间识别身份、婚姻嫁娶等都要依靠家谱，“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仅朝廷专门设立“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和编写家谱的世家，家谱进而也成为一种特殊

的学问，人称谱学。尤其是那些随东晋王室南下、被称为侨姓世族的人更加重视家谱，专掌家谱的谱局也由他们把持，一些著名家谱如《姓氏簿状》《百家谱》《百家谱抄》《新集十八州世族谱》等也都出自他们之手。家谱之所以能够在当时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乡举里选不核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为他们的重视和提倡。据统计，三国西晋时期见于记载的世族谱不足10种，至东晋初年猛增至100余种，后虽因战乱而遭受较大损失，但“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又有许多新谱补充进来，成为国家编修官谱的依据，一些综合性的总谱也因之产生。

东晋南朝时期编修的家谱，从形式上看既有反映一个家族源流的单一家谱，也有全国总谱、郡谱、家传和列传式家谱，其规模有数卷以至数十、百卷不等，仅收录在《隋书·经籍志》中者即达55种、1266卷之多。事实上，当时编修家谱的总量当然远非如此。这些家谱在内容上也大多具备了后世家谱的特征，同时像后世那样攀附祖先、仿造世系、牵强附会等修谱通病也已出现。

另外，当时还有平阳贾氏、东海王氏、琅琊王氏、南阳刘氏、东海何氏等编修和研究、利用家谱的谱学名家，其中平阳贾氏的贾匪之、贾弼之、贾渊祖孙三代“世传谱学”，编修了《十八州士族谱》700多卷。东海王氏的王僧孺“入直西省，知撰谱事”，编修了《十八州谱》710卷、《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琅琊王氏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的“侨姓首族”，为适应从政为官的需要，不仅很早就编写了自己的家谱，而且族中还有多人精通谱学。如在南朝初年，裴松之注释《三国志》时，两次引用《王氏谱》，说明其最迟在这时已有了自己的家谱，后人也说“晋丞相王文献公导，渡江始立家谱”。所以，至梁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不仅多次引用其家谱，还分别利用了王敦等13人别传，以及《王丞相（导）德音记》《王司徒（珣）传》等书籍，这些也都